

苏东坡

政治主张探究

赖正和 著

一时多少
豪傑
在公瑾
當年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苏东坡

政治主张探究

赖正和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一
家
理
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苏东坡政治主张探究 / 赖正和著. — 成都: 巴蜀书社,
2011.8

ISBN 978-7-80752-851-7

I. ①苏… II. ①赖… III. ①苏轼 (1036~1101) — 政
治思想—文集 IV. ①D092.44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62557 号

苏东坡政治主张探究

赖正和 著

责任编辑 童际鹏

特邀审稿 崔艳红

封面设计 张 科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翔川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10mm×148mm

印 张 8.5

字 数 250 千

书 号 ISBN 978-7-80752-851-7

定 价 2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序

柳 絮

二十几年前，赖正和先生还在主持文学季刊《沫水》的工作，我捧着我创作的小说初稿去登门求教。他叫我把稿子留下，抽时间帮我看。闲谈间，我看见他的书架上插着十来本有关苏东坡的书，忍不住走过去抽出几本来翻翻。《苏轼文选》和《苏轼诗选注》里面的文字都是竖排的，一看版权页，竟是50年代出版的。封面已经磨得很旧了。书里有不少用红、蓝两种颜色画的圈圈杠杠，天头、地脚也有用红、蓝两种颜色批的文字，短的只有几个字，长的竟有四五句，我认得是正和先生的笔迹。这使我很是惊讶，我知道正和先生一直从事文学期刊编辑工作，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辅导、培养业余文学作者，还挤时间进行文学创作，已经够累的了，没想到他还这么认真仔细地阅读苏东坡的著作。

我问他：“您喜欢苏东坡的东西？”

他说：“我是地道的眉山人，比眉山先贤苏东坡恰好小九百岁。小时候常随父兄拜谒眉山三苏祠，听讲三苏的故事，学读三苏祠里的楹联和碑文，在稚嫩的心田里播下了崇敬三苏的种子。稍长，学了苏东坡的‘大江东去’，对苏东坡的崇拜竟急剧升温。慢慢地，便产生了阅读苏东坡著作的渴望。参加工作后有了工资，见到有关

苏东坡的书就想买到手，你翻的这六七本就都是在 50 年代买的。有空，就读它几页，这已成为我的一种习惯。”

90 年代初，我突然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一篇仅有两千多字的文章，却标着一个很长的标题：《苏东坡不仅是文学家而且是具有革新思想和主张的政治家》，作者竟是正和先生。这使我再次惊讶，这时正和先生同时主持着旅游文化杂志《峨眉山与乐山大佛》和《乐山文化艺术报》的工作，也还继续创作文学作品，时间十分紧迫，可怎么一下子写出了这么一篇带有学术价值的研讨文章来了？后来见了面，他告诉我，他一直没有中止搜集和研读苏东坡的著作，原本打算在素材积累够了也思索透了之后，以苏东坡为主人公创作一部长篇小说。谁知在研读一些资料时发现，人们比较一致地承认苏东坡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可从政治角度评说苏东坡就众说纷纭了，竟有不少人（包括专家、学者）认定苏东坡是反对政治改革的保守派。他却认为，只把苏东坡看做伟大的文学家是很不够的，苏东坡在政治变革方面的思想、主张及其实践也是很值得肯定的，苏东坡也是封建时代的一个进步的政治改革家，所以，他写了这篇短短的论文，抛出他的观点。我说，用这么一个递进复句做标题显得太冗长了。他却说，标题就是他的观点，也是论文的结论，就是要直白而明确地告诉读者。

90 年代末期，眉山地委宣传部邀约刚刚退休的正和先生写一部关于苏东坡政治主张的书稿，他欣然应允。他在多年积累的基础上，又用了半年时间专心专意地研读苏东坡的原著以及相关书籍，待有了自己的较为成熟的基本符合历史的认识之后，才动笔撰写。这时，他所在的单位重新调整了住房，他家的上下左右邻居一户一户地接着装修房子。从早到晚，电钻、电锯的刺耳尖叫和铁锤砸墙的撞击声接连不断，别说写文章，就是喝茶聊天也不安生。可他别无选择，只能在各种噪音的包围攻击中提起笔来。经过半年的艰苦笔耕，书稿终于杀青。我是这部书稿的第一读者。读完后，我第三

次感到惊讶，我原以为正和先生作为一位作家，形象思维是他的强项，没想到他的逻辑思维也竟然如此缜密，推理严丝合缝，把一部论著写得这么有说服力。这部书稿在2001年出版时定名为《苏轼与北宋政治变革》。全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张志烈先生评论说：“《苏轼与北宋政治变革》一书，集中研究苏轼的政治主张。书中对苏轼改革主张的社会背景、理论来源、具体内容作了考论，并用以和王安石变法主张相比较，非常清晰地说明了苏轼政治思想形态和其历史价值，对于在这个领域借鉴前人，发扬华夏优秀文明传统，很有现实意义。”^①

正和先生退休后，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研读苏东坡的原著。他说，做学问必须重视“第一手”资料，第二手、第三手资料只能做参考。如果不研读原著，轻信第二手、第三手资料，往往会“上当受骗”。真正做学问，应该从原著中去发现、挖掘一些新的独到的东西，不去吃现成的馍，更不去吃别人吃过的馍。这样做，当然很费劲，也不可能在短时间里写出很多有独到见解的文章。所以，追求快速出名的人不肯这么做，追求经济效益的人更不会这么做。有些人找到了捷径，那就是充分利用第二手、第三手资料，挑挑拣拣，拼拼凑凑，修修补补，便弄出一本书来。这样的作品有何价值？自欺欺人罢了！正和先生这么说，也这么做。他把《苏轼文集》翻来覆去地研读，绿色封皮竟磨出了不少白色来，内页的白色边沿也因翻的回数太多而变黑了。近几年他发表的有关苏东坡的论文，都是以苏东坡的原著做根据的，所以很有说服力，别人很难驳倒他。

有一回，我跟正和先生谈到苏学研究，他告诉我，多年以来不少人研究苏东坡的文学作品，取得很多很好的成果，但苏东坡反对王安石变法这道“坎”不好翻，又没法回避，所以好些学者便不去

^① 《中国第十三届苏轼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1页。

研究苏东坡的政治立场、政治主张。而正和先生却愿意“蹉这潭浑水”，一直把苏东坡的政治思想、政治立场、政治主张、政治实践（简称“四政”）作为研究重点。经过十来年的苦心研究，他现在明确提出两个基本观点：

一是“一同三异”说，即苏东坡与王安石两人的政治主张有“一同三异”。“一同”是他们都认识到当时的政治非改革不可，都主张改革，都提出了各自的改革主张。“一异”是苏东坡强调富民，王安石强调富国。“二异”是苏东坡强调“任人”，王安石强调“任法”。“三异”是苏东坡主张“渐变”，王安石主张“急进”。

二是“苏轼反王正确”说，他认为，苏东坡反对王安石变法集中于一点，那就是反对新法敛财，加重人民负担，所以苏东坡反对王安石变法，其实质是为人民代言，根本没错。

最近几年他写了二十多篇苏学论文，多是探讨苏东坡“四政”的，其中一些受到好评。例如，《读〈康震评说苏东坡〉后与康震先生商榷》发表时，编者在《本期导读》中评介说，该文“言之有理，持之有据，不落言筌，振聋发聩”。全国第16届苏轼学术研讨会《综述》评价说，该文“用大量事实，对北师大教授、文学学院副院长康震关于苏东坡政治保守、反对改革以及打击报复改革者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实际上是对苏东坡、王安石二人的政治主张进行了比较研究，更加突出了苏东坡政治主张的合理性。这样的文章针对性强，观点鲜明，可读性强”。从这些评介、评价可以看出，正和先生的苏学论文是有一定质量和影响的，也证明了他在苏学研究中的认真和严谨。现在，正和先生选出二十来篇论文结集出版，我相信会对苏学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目 录

序	柳 絮 (1)
---------	---------

上 编

苏轼与王安石变法	(3)
支撑苏东坡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精神力量	(43)
读《康震评说苏东坡》后与康震先生商榷	(58)
苏东坡在政治上是个什么角色	(92)
苏东坡政治主张的和谐追求	(95)
苏东坡谪黄思愆之我见	(108)
苏东坡一生为民请命	(121)
试与《走近东坡》编写者商榷	(135)
《苏轼九章》十二憾	(158)
谈谈苏东坡的兵制改革主张	(181)
免役法与兵制兵役何干	(192)

下 编

苏东坡与王朝云	(203)
---------------	-------

谈史请勿随意	(216)
试说苏东坡服饰	(220)
解读苏东坡知密州时的官职	(227)
也探三苏故居	(230)
苏东坡当过“常州团练副使”吗	(242)
再说苏东坡当过“常州团练副使”吗	(246)
从“者希年”说起	(250)
苏东坡与酒	(256)
说“蕉叶”兼及东坡酒量	(260)
后记	(264)

上 编

苏轼与王安石变法

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37岁的王安石作《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建议仁宗改革吏制，这比苏轼作25篇《进策》全面系统论述其政治变革主张早三年。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王安石“越次入对”，首次面对面地与神宗长谈“治国之道”，随后奏进《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翌年，49岁的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即副宰相，组建“制置三司条例司”^①，在全国推行新法。其时，33岁的苏轼在京任“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职位不高，还不能参与朝廷大政，但他出于忧国爱民，竟上书神宗全面批评新法。熙宁三年（1070），50岁的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掌握朝政。苏轼竟不顾个人安危，继续给神宗上书，执著地批评新法。熙宁四年（1071）四月，苏轼被排挤出京，担任杭州通判（地位略次于州府长官）。此后，他仍坚持批评新法，但大多借用诗词形式来表达，不像在京时与王安石正面冲突。

因为苏轼激烈地全面批评王安石变法，所以长期以来不少人把他看做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否定他主张政治变革的一面，这是很不公平的。

^① 主持变法的机构，筹划国家财政经济与变法事宜。

—

仁宗时期，号称是有宋以来的全盛时代。从表面上看，国家太平无事，长治久安。王安石却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当时顾内不能不为社稷担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益困穷，而风俗日益衰坏。这表明王安石看到了在所谓全盛的表面现象之下潜伏着可能动摇北宋王朝统治的内外危机。这与苏轼关于北宋中期“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的论断，是一脉相通的。

王安石在《上时政疏》中说，晋武帝、梁武帝、唐明皇都是“聪明智略有功之主”，都是自秦以来“享国日久者”，但他们“享国日久，内外无患，因循苟且，无至诚惻怛忧天下之心，趋过目前，而不为久远之计”，自以为祸灾不会及身，“而不自知”灾祸“忽然已至也”。他希望仁宗陛下“惻怛忧天下，而以晋、梁、唐三帝为戒”，“询考贤才，讲求法度”，以维持、保守天下大器。可是，现在“官乱于上，民贫于下，风俗日以薄，财力日以困穷，而陛下高居深拱，未尝有询考、讲求之意”。这样“因循苟且，逸豫而无为，可以侥幸一时”，但不可能使社稷旷日持久。等到灾祸及身，再想“询考、讲求以自救”，已经来不及了。王安石认为仁宗朝“因循苟且，逸豫而无为”；苏轼认为仁宗朝“怠惰弛废”，“宴安无为”，“因循苟且”，“畏期月之劳而忘千载之患，日趋于亡而不自知”。两者同出一辙。

王安石在《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说，本朝累世沿袭乱世败坏之习俗，却无亲友群臣提出异议。一切都顺其自然发展，不肯施用人力加以改变。君子虽是得到重用，但小人也置身其间；正论虽被容纳，但邪说有时也被采用。以诗赋记诵求取天下人才，但没有学校培养人才；以科名资历定等级次第来授予官职，但没有考核检验

百官的方法；监察州县的机构没有负责检察的人员；结交私党以提高声望的人多得显官，独立地尽心尽职的人却受排挤。由于问题成堆，难以解决，故君臣上下都“偷惰取容而已”。王安石批评北宋中期无处不存在因循守旧、疲沓苟且、萎靡度日的风气。苏轼也批评朝廷“上下相安，以苟岁月”。两者又同出一辙。

苏轼指出，北宋中期有三患，患无财，患无兵，患无吏。王安石说，朝廷对于理财，大抵无法，所以皇帝“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这就是苏轼所说的患无财；王安石说，兵士中混杂着疲惫的老弱者，朝廷既不告诫他们加强训练，又不选择合适的将帅长久地掌握兵权，这就是苏轼所说的患无兵。王安石说，“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但未必能办到，因为“方今天下之吏才少故也”，这就是苏轼所说的患无吏。

由上述可知，王安石和苏轼对北宋中期社会危机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

苏轼和王安石由于认识到北宋中期潜伏着可怕可忧的社会危机，都产生了改革弊政的欲望，都认为必须“涤荡振刷”、“改易更革”，否则将“日趋于亡”，并且都提出了改革弊政的主张。

王安石论述改革的文章，主要有《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上时政疏》和《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等。其中，以《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为最著名，长达万言。《上时政疏》和《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篇幅都较短。

苏轼论述改革的文章，主要有 25 篇《进策》和《御试制科策》、《思治论》等。

将王安石和苏轼两人论述改革的文章作比较，虽然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比苏轼作 25 篇《进策》早三年，但苏轼论述改革的文章比王安石的文章多，字数也多得多，其 25 篇《进策》就有数万言。王安石文章论述内容的范围有限，比较突出的就是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论说吏制改革和人才的教、养、取、任。

苏轼文章论述内容则涉及经济、政治、军事乃至思想、文化等，比王安石论述得全面、系统和深刻。

王安石主张的改革就是变法。法是什么？法就是根据统治阶级的意志，由国家制定的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执行的行为规则。凡法律、法令、条例、规则、决定、命令、判例及惯例等，都属于法的范畴。变法，就是改变旧法，推行新法。王安石把改革聚焦于变法，企图通过变法来革除北宋中期的积弊，解决其积贫积弱的问题。虽然他的变法也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但他主要着眼于“法”的改变，与苏轼的政治变革主张相比较，其含义狭窄得多。

苏轼的变革主张是一套完整的系统的东西。它要求在经济、政治、军事以及道德、风俗、思想、文化等方面革弊立新，这就不仅仅要“变”一些“法”。变革的含义应当比变法的含义更广泛更深刻。

二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什么？简而言之，是“富国”。王安石变法，就是变着法子为国家兴利聚财。

著名历史学家、北大教授邓广铭先生在1997年出版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以下简称《王安石》）一书明确地说：“王安石的政治改革，规模宏阔，所涉及的范围既深且广，但其最为核心的问题却在于‘理财’。”“理财”，的确是我们谈论王安石变法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

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谈“增吏禄”时，略略谈到“理财”问题。他说，他原本没有学过财利管理，但也知道前世管理财利的大概情形，“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现在朝廷财用不足，公私困穷，是因为朝廷理财

不得法，理财的官员又不能把握时机灵活理财。如果理财得法，理财的官员又能把握时机灵活理财，朝廷的财用必足，增加吏禄也就“不足以伤经费”了。王安石的意思是很明白的，朝廷依靠天下的劳动力生产天下的财富；朝廷取天下的财富供治理天下的统治集团花费，这是天经地义的。他主张朝廷“取天下之财”要得法，理财的官吏要把握时机灵活地“取天下之财”。《王安石》一书对此议论道，从王安石“这一原则性主张的实质及其在后来王安石制定和推行新法时所起的作用来看，其意义及其重要性都是绝对不能低估的”，这“也是他在熙宁年间厉行变法时一直奉守的一个原则”。这段话说得十分透彻精辟，完全能帮助我们理解王安石变法的核心问题及其目的。

王安石在《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中说：“夫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有财而莫理，则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如是而天子犹为不失其民者，盖特号而已耳。”句中“有财而莫理”的“理”，即“摄取”也。在这里，王安石把理财看做巩固帝王统治的重要手段，所以他认为必须由朝廷派良吏依法“理财”，必须由朝廷掌握“取予之势”，摄取万物之利。否则，田野街巷中地位卑微的人都能私自操纵摄取与给予的权势，独揽万物之利，用来跟人主争夺天下的百姓。《王安石》一书对此议论道，王安石“是从封建王朝中央集权的观点出发，认为全国财富的开阖敛散之权，必须操纵在中央政府的手中。然后政府对财富才能运用自如……在社会上也不至产生地头蛇般的豪强兼并之家，成为分割王朝政府的一种势力”。这段话也可帮助我们理解王安石主张理财的用意。

王安石在《乞制置三司条例》中提出：“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于公上。”句中涉及两个经济学的概念——轻重和敛散。古人认

为“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认为货币、谷物和万物之间存在着相反的轻重关系，即“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主张国家通过政权力量控制货币、谷物和万物，调节其轻重关系，从而平衡物价，抑制兼并，打击大商人，增加财政收入。这就是所谓的“轻重”。所谓“敛散”，就是通过收、放货币或商品以控制商品流通。王安石主张把“轻重、敛散”的控制权收归朝廷，目的还是为了把“天下之财”“理”入财政。

王安石在《再上龚舍人书》中说，“某窃谓百姓所以养国家也，未闻以国家养百姓也”。他认为，只有以百姓养国家，没有以国家养百姓的。这恐怕就是他主张“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思想本源。

至此，可作这样的概括：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是理财；理财的含义就是“取天下之财”；理财的目的就是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富裕国家。

苏轼由于“民为邦本”的思想入其骨髓，在考虑问题时总是把“民”放在第一位。他明确地说：“民者，天下之本”，“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既然天下不是君主私有的，而是人民的，君主仅仅是为人民主持天下而已，那么，君主的一切政策都应当为人民着想。苏轼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提出的政治变革主张，自然是“为民”的成分含得多些，与王安石变法主要在于“富国”是相左的。打比方说，苏轼与王安石抱着对时局的相同认识，一同站在主张改革的起跑线上，但他们跑向的目的地却不相同，一个跑向“裕民”；一个跑向“富国”。

苏轼在《苏氏易传》卷八中解释“圣人之大宝曰位”时说，圣人的“位之存亡寄乎民，民之生死寄乎财。故夺民财者，害其生者也；害其生者，贼其位者也”。苏轼这段话把位、民、财三者的关系说透了，皇帝统治地位的存亡依附于人民，人民的生存依附于